

## 關於托洛茨基及其評價問題

◎ 杜應國

偶然在《視界》上讀到杜建國先生的大文〈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視界》第6輯，2002年4月，以下簡稱〈托文〉）。真沒想到現在也還有人對托洛茨基有興趣，而且作的又是翻案文章，自然多了幾分注意。但讀過之後，卻發現問題多多，尤其是在關涉托氏評價、以及對一些相關的史實和理論問題的讀解上，作者的看法或過於簡單、片面，或似是而非，讓人不吐不快，且寫出來，與作者一同討論。

### 問題一：關於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異同」

從切入點看，作者寫此文似是為反駁鄭異凡先生的〈由「先知」引起的話題〉一文（載《讀書》1999年第五期），這本屬正常。但我不知作者哪來的那麼大的情緒，以至文中對鄭異凡先生的多處指責都有欠厚道，有些指責甚至連邏輯都不顧。比如，作者在談到鄭先生對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比較分析時，引了鄭先生一句認為托氏與斯氏是「不共戴天的死對頭」的話，然後又引了鄭先生「斯大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斯大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斯大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在農村實行集體（化）」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張的」等語，理直氣壯地反問道：「既然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主張大同小異，那麼他們又怎麼會不共戴天的呢？」<sup>1</sup>這就很讓人驚訝，「主張大同小異」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嗎？除了主張，還有性格、氣質、以及個人恩怨、權力之爭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特別是具體到托洛茨基與斯大林而言，命運註定這兩個人幾乎是從一見面開始就處於互相敵視的位置，以至列寧逝前還在擔心他們兩人發生衝突以及由此引起的黨的分裂<sup>2</sup>。這種同中有異——不是因為政見，而是因為其他原因形成的對立和衝突的情況，尤其在政治人物中並不鮮見。而況「主張大同小異」一語並非鄭先生原話（對於托氏與斯氏的「主張」而言，是不好以簡單的「異同」論之。上文因只考慮邏輯，對此未作甄別，下文將詳論之），但作者只顧傾倒心中的憤懣，似乎顧不了這許多，仍沿著自己的邏輯挺進，緊接著竟發出了這樣令人吃驚的責難：「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鄭異凡先生竟是在讀了《先知三部曲》後來重複這種評價的，因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如果不是說誣蔑的話。」<sup>3</sup>

且不說《先知三部曲》是否「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尚需查證（下面我們將會看到），憑常理也該明白：別說《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徹本人就是個托洛茨基主義的熱烈擁護者、崇尚者，他的著述和評價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就算他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了客觀公正、全面準確，也不可能定於一尊，誰都不能表示不同意見；誰讀了《三部曲》，誰就只有雙手贊成的權利！？這叫甚麼學術？恐怕多伊徹本人也不會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吧？

更重要的是，所謂「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即托氏早先提出來的加速工業化與集體化的主張，後來由斯大林所實現的說法，並不是鄭異凡先生一個人的看法，而是國際學術界中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如果不能說公認的話。因此，包括《先知三部曲》在內，基本上持的也是這一觀點，不知作者為何視而不見。且引幾段如下<sup>4</sup>：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左傾方針持一種相對讚賞的看法，承認它的積極意義。這一事實使托洛茨基產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們搞糊塗了。

在十月革命11周年慶祝日，從莫斯科紅場上傳出的官方口號是：「警惕右傾危險！」「打擊富農！」「抑制耐普曼！」「加速工業化！」這些口號響徹了整個國家，擴散到了最邊遠的角落，甚至也傳到了阿拉木圖。這正是托洛茨基長期以來試圖說服黨採取的政策！……可以這樣認為，執政派現在被迫抄襲托洛茨基的思想，這一事實就是為反對派所作的最好辯解。

這兩個對手的命運就是這樣古怪，當托洛茨基被驅逐出俄國之時，斯大林卻著手以野蠻的方式消滅俄國的落後和野蠻，仿佛是要經典馬克思主義回流，而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將要實現托洛茨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綱領。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宣導人，但在其後的十年中，斯大林卻是它的執行者。

引文未免累贅，卻又必不可少。只不過，他們兩人的關係事實上遠比這裏說的要複雜得多。

從性格上講，在俄共的早期政治領袖中，恐怕再難找出有哪兩位像斯、托二人這樣，有著那麼多的相似與差別了。同樣的倨傲、自負，同樣的不甘人下，有著強烈的領袖欲，並且同樣的傾慕權力，同樣的敏感自尊，喜好虛榮。猶如同性相斥的磁場原理，過多的相似也產生了太大的差別：他們一個熱情似火，一個卻冷靜如鐵。一個雄辯滔滔，長於辭令；一個卻沉默寡言但更精於算計。一個喜歡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尤其樂於置身在漩渦中心，與革命進行親密接觸，直接對話；另一個卻更喜歡側身一邊默默做著黨所交給他的工作。與語言乏味，舉止粗俗的斯大林相比，才氣縱橫的托洛茨基往往顯得更有教養，也更注意風度。托氏是思想家、革命家，比斯氏更擅長理論的創建，真率之外，更不乏幾分革命騎士的浪漫和理論家的坦誠，他相信理論的力量遠遠超過他相信政權的力量，因而也常有為理論所累的時候。斯大林則是個務實的行政主義者，與理論相比，他顯然更迷信組織，更相信權力。身為黨的總書記，他也是把行政能量發揮到極致的權術大師。他的政治哲學實則有著太多的馬基雅維裏成分，骨子裏又帶了幾分拜占庭陰謀家的氣質，常常在不動聲色之中就能置對手於死地。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鐵腕人物，對大權在握，發號施令有著同樣的喜好。別看托洛茨基老在民主問題上向斯大林主流派發難，但只要想一想他在內戰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對行政命令主義的過分依賴（或許正是列寧所批評的「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以及他天性中喜歡紀律與服從的強制性格傾向，再想一想他對工人反對派的厲聲呵斥，以及在工會問題爭論中對軍事共產主義強制方法的偏愛（「擰緊螺絲釘」、「整刷工會」等）等等，不難想像一旦大權在握後的托氏會是甚麼樣<sup>5</sup>——儘管不會與斯大林完全一樣！

不過，即使如此，從政治主張上講，斯、托兩人確實是不好將其放到一起，簡單地論其異同的，原因很簡單，就「主張」而論，托氏有理論，而斯氏沒有理論。具體到工業化和集體化問題而言，斯大林最初反對托洛茨基等人要求加快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進程，並非是真的認為這會中斷新經濟政策，影響工農兩大階級的結盟，而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拱衛自己列寧繼承人的正統形象，穩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出面與托氏等人進行理論爭辯的主要是布哈林，而不

是斯大林。而斯氏在後來轉向，以托氏也無法贊同的激烈手段和速度，迅猛推行集體化與工業化的方針，也並非是害怕農村的資本主義復辟，害怕社會主義受到削弱，而是從糧食收購危機中看到了農民反抗的可怕，因此亟欲要將之納入龐大而又嚴密的官僚化計劃體制（當然也是行政組織體制）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要拋棄布哈林，轉而向托洛茨基派的理論求救，並故作慷慨地接受了許多反對派骨幹的「投誠」，以至連托洛茨基本人也一度判斷失誤，想在斯大林需要他們的時候伸手相援，與斯氏結盟來反對布哈林。實際上，斯大林心裏壓根就不會原諒反對派——他們的最終結局都證明瞭這一點。所以，即使他最終執行了托氏的綱領，也不好就說他的主張與托氏「大同小異」。對斯大林來說，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以至後來居然敢與德國法西斯結盟瓜分波蘭，那麼，要不要搞工業化和集體化，就只是個為我所用的問題，而不存在甚麼剽竊與認同的嫌疑。一句話，這只是斯大林為實現他的獨裁之路所要跨越的一道小小的障礙而已。

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鄭異凡先生並沒有簡單地說他們的主張「大同小異」，而只是說「斯大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說「斯大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等等，應該說，話還是講得頗有分寸的，由此得出「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爭論才是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爭論』」也並沒有甚麼錯，與「不共戴天」的說法也並不自相矛盾。至於講到托氏的主張至少在時間上與方法上跟斯氏的集體化工業化不同——正像〈托文〉作者在文中所一再爭辯的那樣，那麼，我想提醒作者注意：這其中除了托氏提出的僅僅只是理論而斯氏實行的又僅僅只是結果的差別之外，也還有一個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問題。對於理論邏輯，多伊徹就曾提到這樣一個細節：當托洛茨基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號召大家完成偉大而艱巨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任務時，克拉辛曾向他問道，他是否充分考慮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含義？並向他提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通過殘酷的殖民掠奪，摧毀英格蘭的自耕農，摧毀印度的家庭紡織業等等，才得以完成的。「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屍骨之上，現代紡織業才得以興起。」據說，托洛茨基聽後，當時就跳起來抗議說，他的建議「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對此，多伊徹寫道：「這當然不錯。但不管怎樣，他的立場的邏輯發展不就是將導致『對農民的掠奪』嗎？」<sup>6</sup>據多伊徹說，此後，托洛茨基便很少再使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語了。也許他已覺察到包含在這一「規律」中的那層不詳的陰影？

至於歷史邏輯，多伊徹曾針對按照托洛茨基的路子歷史會怎樣的設問，講過這樣一番頗為深刻、透徹的話<sup>7</sup>：

如果要問：托洛茨基會把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廣大蘇聯人民免遭斯大林統治下所受的損失、貧困和壓迫，同時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規模實現工業化？或者他能說服而不是強迫農民合作經營農業？進行這樣的推測毫無意義，這些問題是不可回答的……事實上，20年代的政治演變已事先決定了30年代俄國社會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這一演變導致獨裁和鐵的紀律，進而導致了強行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

## 問題二：關於新經濟政策

1926年，在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結成聯合反對派同斯大林主流派的爭論中，新經濟政策是個焦點。儘管由於新經濟政策是列寧生前所訂，在令人崇敬的領袖剛剛去世之後，誰也不會去冒觸犯列寧思想遺產的風險，因而，表面上並沒有人對新經濟政策直接提出

批評。但從托氏等人關於加速工業化，加強計劃化和集體化，以及出於對農村資本主義因素增長的憂慮而提出的限制富農，對富農課以重稅等主張中，還是不難看出，根子就在新經濟政策！這是關鍵，也是雙方分歧的實質之一。

無論是從當時還是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新經濟政策的真正意義，是在於它啟動了被革命和戰爭打斷了的市場機制，開啟了一條通向市場經濟的大門。恰恰是這一點，與人們所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明顯不符，因此，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初就在黨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列寧為此而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並將之解釋為一種暫時的「退卻」，一種「迂迴曲折」的進攻。在隨後的幾年裏，列寧為新經濟政策傾注了大量心血，寫了不少文章，不斷發現和挖掘新經濟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給予新的闡釋和提升。大體說來，列寧賦予了新經濟政策這樣幾重意義：

（1）是從非常態的戰時體制轉向常態的和平建設體制的一種過渡<sup>8</sup>。在強制與半強制的戰時體制下，你可以用超經濟方法向農民強行徵集「餘糧」——或者像列寧後來所說的那樣，有時甚至是農民的「必需糧」，但在和平體制下，你卻無法做到這一點。餘糧收集制後來引發的嚴重危機、動盪和全國雪片一般的抗議都已證明：農民決不允許將強制的戰時紀律永遠盤旋在他們頭上！

（2）新經濟政策是工農兩大階級政治聯盟的經濟基石。平等的聯盟，必須以平等的交換關係作基礎，否則，政治平等就無法得到保障。「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它在哪裏？在同農民進行商品交換！！」<sup>9</sup>

（3）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適應於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建設道路、建設方法，它「並不改變工人國家的實質，然而卻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sup>10</sup>在俄國這樣一個小農佔多數的國家裏，無產階級不能拋棄小農，而必須採取與之結盟的戰略，為此，就需要找到一種適合他們，為他們所樂於接受的方法，以便在自願和平等的基礎上，改造他們，帶領他們一同走上社會主義。改造小農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所以，新經濟政策也是長期的。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很多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卻一直未能認識到，新經濟政策實則是從戰時體制轉向和平常規體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戰略轉移！他們恪守著某些戰時共產主義的也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信條和思想原則，將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把商品關係、市場原則等同於資本主義，視個體勞動為危險的自發資本主義勢力，所以，對新經濟政策實行幾年後重新活躍起來的農村經濟狀況和市場經濟關係作出了片面的、也是誇張的估價。

不錯，托洛茨基本人早在20年初就曾提出過實行糧食稅的建議。多年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sup>11</sup>：

我從烏拉爾帶回大量有關經濟情況的考察報告，這些報告的結論，一言以蔽之：必須拋棄戰時共產主義。我的實地調查使我相信，因內戰條件強加於我們的戰時共產主義方式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為恢復我們的經濟生活，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引進個人利益的成分；換言之，必須恢復某種程度的國內市場。我向中央委員會遞交了一個方案，計劃用一種徵收糧食稅的辦法來取代征糧制，並恢復商品交換。

但事實上，托洛茨基當時的認識遠不像他後來所標榜的那樣，似乎已真的看透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本質，否則，他就不會在自己的建議被否決之後，立即又迅速祭起戰時共產主義的法寶，並將之嚴厲地貫穿到鐵路系統的整頓中，進而更提出了「勞動軍事家化」，「擰緊螺絲

釘」等加強戰時體制的口號，由此挑起了一場關於「工會國家化」問題的爭論。細觀托氏在爭論中的主張，他與列寧的分歧，實質上是一個要不要將戰時原則繼續運用於和平時期的問題。從托洛茨基後來的一系列主張及其表現看，應該說，托氏的思想一直都未能走出戰時共產主義的迷霧。

需要指出，人們通常所說的戰時共產主義，實際上包含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內容。一類是指那些為應付戰爭需要而採取的、具有強烈軍事化特徵的臨時性措施；另一類則是指為「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而採取的措施（兩者中又有少量交叉）<sup>12</sup>。後者雖然大多是在戰爭時期實施的，但其理論、原則，卻是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已確定了的，諸如剝奪剝奪者，實現國有化，迅速消滅小農，實現集體化，以及消滅商品貨幣關係等等。這是所有社會主義者，也是每個布爾什維克都深信不疑的信條。所以，當列寧提出用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時，黨內的思想阻力實在不小，就即使是像托洛茨基這類敏感而又務實的領袖人物，也只不過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一種權宜之計，一種為緩和巨大的軍事壓力而被迫作出的暫時退讓。列寧則不同。正是在工會問題的爭論中（此時剛好結束的克里木戰役成了國內戰爭基本結束的標誌），列寧敏銳地抓住和平時代已經到來這個主題，開始從時代轉折的高度來考慮如何突破戰時共產主義的局限，以實現工作重點也是戰略中心的根本轉移。可以說，列寧在爭論中之所以會在工會國家化問題上發生重大的立場轉移（從贊成到反對）<sup>13</sup>，正是他在時代轉折的推動下來重新審視和調整戰時共產主義的戰略與策略，以為和平時期的建設尋找出一條更適合俄國國情的道路或方法的一次重要探索，它為後來以新經濟政策為標誌的戰略大轉移作了必要的鋪墊和準備，並由此而成為列寧晚年一系列思想嬗變的開端和起點。沉醉於戰時共產主義直接過渡夢想中的托洛茨基，卻未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也不理解新經濟政策所包含的巨大歷史意義，所以他才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一道，對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後果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從理論上講，托洛茨基等人是不相信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但無論是從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表述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中，還是從托氏所主張的工業化、集體化、計劃化要求中，實際上都暗含著「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邏輯。或者，審慎一點看，起碼也可以說，托氏等人在歐洲革命遲遲沒有爆發的情況下，懷著如何將俄國革命堅持下去的憂慮，迫切希望能夠儘快地加強它的社會主義因素，減少和限制資本主義因素，並且盡其所能地保持它純粹社會主義的性質。正是沿著這樣一種思路，托氏等人才認為，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得到恢復的商品貨幣關係，以及重新活躍起來的個體、私有經濟，不僅中斷了戰時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夢想，而且還加強了農村的資本主義勢力，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並使富農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加劇了農村的階級鬥爭態勢。為此，他提出的加速工業化，實行集體化，向富農課重稅等主張，其著眼點，都是為了抑制新經濟政策的「消極因素」（資本主義），加強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問題在於，俄國農村的實際情況，是否真像他們所擔憂的那樣，已經嚴重到了如此危險的程度呢？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正像今天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蘇俄政府當時所使用的「富農」一詞，是個標準混亂，含義模糊的概念。按照這個邊界並不清晰更遠遠談不上科學的稱謂所統計出來的富農數，在集體化以前的1927年，也只佔總農戶的約3.9%左右，其經濟水準則只略當於戰前的中農，或比中農稍好一點<sup>14</sup>。其次，關於農村中的兩極分化現象，無論是當時的統計還是事後的研究均表明，這種分化實際上是一種有利於共同富裕的積極現象。因為，農村的分化層主要發生在貧農階層，其分化趨勢是大量貧農上升為中農，少量貧農則因各種原因破產淪為農村無產階級；直至集體化開始之前的1927年，中農已佔到農村人數的62.7%，

貧農則只佔33.4%——這就是所謂的「中農化」現象。對此，無論是生前的列寧還是後來的布哈林，都對之作出了積極評價。而兩極分化的分化層應是中農<sup>15</sup>。若少量中農上升為富農，大量中農下降為貧農，則可謂之兩極分化。應該注意區分這兩種分化的不同性質，還應該看到何為主體，何為支流。從這個角度看，當時農村分化的總趨勢主要是良性而非惡性。再次，是關於農村個體經濟包括一部分富農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究竟是有益還是有害？是姓資還是姓社？這個問題，以其說是一個現實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觀念問題。而托氏等人正是出於其直接過渡的傳統觀念，才對之作出了否定性的評價，驚之為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擴展。由此可見，托氏雖然在名義上並不反對新經濟政策，但他沿著戰時共產主義的思維慣性所得出的結論、對策，實質上與斯大林後來的做法並無甚麼本質的不同，其邏輯指向到頭來還是將導致新經濟政策的終結！至於托氏當時提出的工業化是否可行的問題，這其實並不是一個願不願、想不想的問題，而是有無可能的問題，是工業化的資金從何而來的問題。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設想，在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硬要採取削減農業投入（以及向富農課重稅）的辦法來增大工業投入，別說這本身省不出幾個錢，就算真能省出錢來，在低生產、低投入的經濟水準下，農業一旦因投入減少而出現萎縮，也會反過來成為制約工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相形之下，布哈林主張在發展農業以增加農業積累的基礎上再來擴大工業生產（投入）的想法，倒是要切合實際得多。

但如果說，托洛茨基當年提出的這些理論和主張尚不失其革命者的真誠，並且尚有其難以擺脫的歷史局限和思想局限，故而多少還能讓人感到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今天的作者——正如〈托文〉的作者一樣，再來不加區別地重複托氏的這些主張，並將之視為唯一正確的理論而給予全面的肯定和熱情的頌揚，卻實在讓人有些不可思議。其中，最讓人不可理喻的，就是作者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那一番新奇的議論了。

### 問題三：關於「民主的計劃經濟」

照我們今天的理解，計劃與市場，正如同商品與物品一樣，是個中性詞，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像過去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個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選擇。計劃並不意味著就是社會主義，市場也並不就代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需要有計劃，計劃經濟也不能沒有市場，兩者相容的，並不具有全面的排異性。

但是，如果倒退二十年，計劃與市場就是兩種社會制度的代名詞；倒退五十年，計劃（經濟）則直接就是蘇聯模式或曰斯大林體制的同義語。〈托文〉作者顯然屬於前者。所以他寫道<sup>16</sup>：

哈耶克們稱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實，蘇聯早在計劃經濟實行前的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時，官僚專制就已確立了。而最早提倡計劃經濟的托洛茨基卻是要求恢復民主的，而主張市場經濟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則是專制的捍衛者，後來又將其專制從政治領域擴展到了計劃經濟中。歷史證明，不是計劃，而是在市場的條件下蘇聯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這就很有點讓人不好理解了：蘇聯「官僚專制的確立」是甚麼意思呢？如果是指布爾什維克一黨專制體系的形成，那麼，它早在新經濟政策之前的戰時共產主義初期（1918年）就已建立了；如果是指眾所周知的斯大林專制統治，那麼，它也不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而是在全盤集體化和強制工業化的過程中才確立的。換言之，斯大林式的官僚專制究竟依靠的是市場

經濟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是集權式的計劃體制為斯大林專制提供了穩固的基礎，還是反過來，是由於斯大林的專制損害了計劃經濟，扭曲了計劃經濟，使之變成了「專制的計劃經濟」？顯然，這些在今天本已不再成為問題的問題之所以會變得如此怪異，原因正在作者頭腦中計劃與市場全面對立，全面排斥的頑固觀念。只是由於傳統「計劃經濟」的名聲不那麼可靠，作者只好另闢蹊徑，特意從托洛茨基的思想武庫中掏出了件「民主的計劃經濟」來，以示與斯大林的「專制的計劃經濟」劃清界限。其基本思路大體如下：「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十月革命，本已讓工人階級掌握了「（對資產階級）行使專政的權力」，但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集團，卻利用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時期「決定暫時取消其他政黨，進而又禁止黨內派別存在」的非常時機，迅速崛起，剝奪了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的權力。「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工人階級民主政治」變成了「幹部決定一切」的官僚專制體制，所以，「民主的計劃經濟」首先必須恢復工人階級的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通過民主權利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sup>17</sup>，或如托洛茨基所言：「官僚專制必須讓位給蘇維埃民主政治。恢復批評權利和擁有真正的選舉自由是國家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這一點意味著恢復蘇聯各黨派（從布爾什維克開始）的自由，恢復工會的作用。」<sup>18</sup>這樣，「由勞動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其需求的順序和資源的分配」，只有這種「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計劃，才會獲得必需的充分資訊，才會符合廣大勞動者的需求，才會在計劃的執行中獲得動力——勞動者的積極性」。並使蘇聯人民擺脫那條「奴役之路」——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是富人的經濟，它是「通過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獲取最大的利潤」，因此，資源「首先被配置用來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誰的支付能力多，簡單地說，誰的錢多，配置給他以滿足需求的資源就多；誰的錢少，自然被配置得少。」而「民主的計劃經濟與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資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來配置，而是由勞動者共同決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資源首先被配置到滿足這些需求的生產中，讓每一個人都能免費地分配到這些產品或服務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實現『按需分配』，以保證每個人享有起碼的合理的生活條件。只有在免費分配的領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餘的資源再被分配到次級需求及奢侈需求等並非人人必需的方面……隨著生產的發展，免費分配的產品逐漸增多，『按勞分配』的範圍更趨縮小，最終將完全排擠掉市場和金錢的作用……」<sup>19</sup>

恕我不能再引下去了。這些耳熟能詳的音調，首先喚醒我的，是關於人民公社、關於一大二公、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歷史記憶。我不知道，作者描繪出來的這等「免費午餐」曾在哪裏出現過，在我的閱讀中，它除了曾短暫地出現在布爾什維克的戰時共產主義體系中外，也曾在中國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驚鴻一瞥地閃過它那誘人的身影——我指的是曾在個別地方出現過的諸如「吃飯不要錢」之類。結果如何，已無須我再來多費筆墨。此外，它還使我彷彿聽到了來自歐洲歷史上某種熟悉而又久已沉沒的迴響。從早期的工團主義，到俄共黨內的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甚至部分地還包括後來南斯拉夫人提出的「工人自治」，百多年來，這類從狹隘的工人或工會利益出發而企望實現真正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思潮，總是不絕如縷，時沉時浮，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因素，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些西歐國家興起的工廠民主制中，也曾得到了部分的吸收和體現。只是不知作者仔細想過沒有，作為一種國家制度設計，「民主的計劃經濟」的民主權利，是只對工人階級開放呢，還是也對所有的社會階級和階層開放？如果是前者，那它就根本談不上甚麼「選舉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並不民主；如果是後者，那麼，誰又能保證這些擁有自由投票權的階級、政黨、派別和集團，選出來的就一定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而不會是其他階級和階層的代表呢？換言之，在真正自由選舉的條件下，又如何來保障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呢？退一步說，就算這一點

不是問題，就算「民主的計劃經濟」果如人願建立起來，難道作者就真的相信，有了「民主地決定」，有了「自下而上的集中」，就有了萬能的計劃？就能夠無所不包地把整個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起來，統起來，而且還能夠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方面都實現「按需分配」，「免費」供給？且不說眾口難調，有人需要頓頓魚肉，有人則需要注意「減肥」，千百萬人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興趣愛好，取捨標準恰恰是最難得統一，也無法「計劃」的；就算能夠計劃，則平均主義問題固然是避免了——如果是「按需分配」的話，但又如何來解決多吃多占、貪汙腐敗、營私舞弊，特權享受等等的問題呢？莫非又要輔之以一場「思想改造運動」？一場「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道德淨化運動？或者就只有按照嚴格的定量、劃一的品種來進行分配？而這種「計劃經濟」的苦頭（當然並不包括「免費」），中國人還吃得少嗎？再說，所謂「自下而上的集中」在實際上究竟是如何操作，如何運行的？是每一個工廠，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單位的每一項計劃，每一個指標都要經過討論決定，再層積疊累地上報「集中」嗎？出現衝突怎麼辦？群體與群體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整體和局部之間，以及近期與長期之間等等，出現利益上的衝突怎麼辦？由計劃部門自行調整、平衡？那豈不有違「自下而上」的公意？或者又來搞一次全民投票？全民公決？這又如何來保障其體制運轉的有效與靈活呢？總之，凡此種種諸如此類十分具體而實際的問題，不知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將如何解決？而且能解決嗎？真不知道，在當今世界憲政民主已相當成熟的情況下，似這類半靠猜想，半是臆斷的極端工人民主的神話，除了有一堆美麗的空話之外還有甚麼？

至於作者關於市場經濟只能導致資源對有錢人的最佳配置的邏輯，則恐怕已經不是甚麼誤解，而是屬於偏見了。不過，似乎仍需指出，有錢人因為有較強的支付能力而可以獲得較多，較好的資源享受這一點，並不就完全等同於資源的巨集觀配置，也不會影響和改變社會資源在利潤驅動下通過市場機制而自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實現結構平衡的原理。畢竟與社會公眾的廣泛需求和巨大的支付能力相比，少數有錢人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市場固然只相信金錢，但它也不能不遵循原理，一旦社會資源在利潤和需求的驅動下出現朝某一領域集中的趨勢（我們姑且假定是少數有錢人的高消費所致），則那只「看不見的手」就會自動對之進行調節；一旦供過於求，利潤原則就會對之進行懲罰，結果，利潤率下降，富餘的資源就會自動轉移，流向其他有利可圖的領域。這就是市場調節，就是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合理與否，與貧富差別並不存在必然聯繫，兩者的調節手段也不一樣。如果把市場視為「奴役之路」，金錢視為萬惡之源，而切望著將它壓縮到最小限度並逐漸取消的話，那麼，這同斯大林的計劃體制又有何區別？而即使是斯大林，也不敢就冒然宣布取消市場和金錢——全世界迄今為止，也就只有一個人和一個國家敢於這麼做，這就是波爾布特和他所統治的柬埔寨！

最後，也許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我還想提醒作者不要忘記，如果這個「民主的計劃經濟」就是用來替代斯大林「專制的計劃經濟」的理想模式，那麼，這是不是也有一點「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意味呢？

#### 問題四：關於歐洲革命或世界革命

在托洛茨基等人與斯大林等人的爭論中，恐怕再沒有哪一場爭論如「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爭論那樣，充滿了學究氣味和經院氣息，以至多伊徹要將之比喻為中世紀的神學家們關於一個針尖能夠站多少天使的爭論。確實，從這場爭論的表面來看，它很像文革初期紅衛兵打的語錄仗，雙方都引證大量的列寧語錄，並按照各自的邏輯進行解釋，針鋒相對，咬文

嚼字而又寸步不讓。但如果真認為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爭論，純屬文字遊戲，那也並不完全正確。其實，這場爭論涉及的問題，實則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民族共產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關係問題——這實質上也是後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生衝突的原因之一。但由於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非幾句話能夠說清，這裏只能姑置勿論。需要費些筆墨的，倒是托洛茨基所堅持的世界革命論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因為作者堅信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準確地預見到具備了一定條件，資本主義世界是能夠渡過其自1914年開始的長期危機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取得勝利」！<sup>20</sup>

本來，對作者這個「在一定條件下」作出的假定是大可不必太認真的，但令人吃驚的是，作者居然就是憑著這樣的假定來反駁鄭異凡先生關於「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能夠進行『自我調節』……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現實的」說法，並責問道：「鄭異凡先生說列寧認識到歐洲革命無望後，轉向了東方。列寧在甚麼時候說過歐洲革命無望呢？鄭先生能夠拿出一點兒可靠的證據來嗎？」<sup>21</sup>

我不知道作者何以要說得如此的理直氣壯，毫無餘地。僅據筆者所見，那證據就很現成。1921年7月11日，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關於俄共策略的報告提綱」中，就有這樣一段明確無誤的話（著重號為筆者所加）<sup>22</sup>：

我們所預料的國際革命正在向前發展。但是，這種前進運動並不象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直線地發展。一眼就可以看出，儘管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跡象很多很明顯，甚至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得多和明顯得多，但在締結和約以後，無論這種和約是怎樣的不好，革命已經不會爆發了！

不知這算不算「可靠的證據」。但我知道要講清這個問題卻不是靠一兩句引文就能解決的。因為，這裏涉及的是列寧晚期思想的一個重大轉變。

眾所周知，歐洲革命一直是俄國革命最重要的一根思想支柱和心理支柱，以至在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時，列寧還說，如果在三年前的「那個晚上，有人對我們說，再過三年就會有今天這個樣子，就會取得我們現在這樣的勝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極端的樂觀主義者都不會相信的……因為我們開始我們的事業時，是把全部希望寄託在世界革命上的」<sup>23</sup>。按照列寧的看法，俄國革命是歐洲革命的序幕。在俄國開始的革命，將由德國、法國、英國去完成。所以，列寧經常重複說，俄國革命還只是這場革命的一半，甚至連一半也不到。

但是，這個被布爾什維克寄以全部希望並苦苦等待的歐洲革命，卻遲遲沒有到來，除了1918年、1919年相繼爆發的匈牙利革命、德國革命曾給人帶來過短暫的鼓舞之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部結束，甚至俄國國內戰爭全面結束，歐洲革命仍然遙遙無期，聲息點無。不僅如此，最讓人失望的是，一戰的結束還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世界格局：曾被寄以最大希望，認為最有可能給俄國革命予直接支援的德國成了戰敗國……

另一方面，隨著協約國於1920年宣布解除對蘇維埃俄國的經濟封鎖，以及隨後召開的熱那亞會議等，過去參與武裝干涉俄國的一些西方國家，也逐漸開始改變對蘇俄的敵視而與之有了多方面的接觸，並在1924年之後形成了一個與蘇聯建交的熱潮。對於國際關係的這種變動趨向，敏感的列寧於1921年就有所察見，他經過審慎分析，作出了整個國際資產階級與蘇維埃俄國之間已經出現了一種「均勢」局面的判斷，並由此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一個結論是希望中的歐洲革命「已經不會爆發了」！——誠然我們不能僅僅根據這一句話就認為列寧已經

對歐洲革命徹底失望，但至少可以說他已明確認識到歐洲革命被推遲、被延緩的事實，轉而注意到「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意義」，並由此得出了第二個重要結論：「他們一定會在世界革命的下一個階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sup>24</sup>

別以為列寧的說法只是一時衝動，隨口說說。事實上，這裏涉及到的，是在俄國革命從戰爭轉向和平，從迅速爆發連體成片的世界革命希冀轉向只能是一國堅持社會主義的現實之後，列寧晚期思想所出現的一系列轉變之一。因此兩年之後，當列寧在疾病的折磨下出於對自己將不久于人世的擔心而亟欲要以口授記錄的方式，趕緊將自己心中一些很重要的思想表達出來，留給他的同志們時，他又一次回到了這個題目上，並將之表述得更清楚、明確，這就是他通過口授記錄所留下來的最後一篇文章〈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列寧在文中分析到，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一戰）已經改變了舊有的國際關係體系，使之出現了這樣一些新的特點和新的變化：一方面，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出現了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分野，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正在受到另一些西方列強的「啄食」而使它「很難抬起頭來」。另一方面，在戰勝國一邊，又出現了因為勝利而向本國的被壓迫階級作出一些不大的「讓步」的情況，而「這些讓步終究能把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推延下去，造成某種『社會和平』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不會是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完成的。」

同時，在另一邊，在落後的東方，又有許多國家如印度、中國等等，由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而被拋出了自己發展的常軌，「開始了一般歐洲式的波動」，從而「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於是，整個世界被「分裂為兩個營壘」——落後的但是革命的和被壓迫的東方，先進的但是反革命的和壓迫者的西方。這樣，「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於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俄國革命的任務，或者說俄國無產階級應該採取的策略，就是「必須極其慎重地維護我國的工人政權，保持住工人政權在我國小農和最小農中間的威信和對他們的領導，」並使之能夠堅持到「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義的東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同雖然落後但是佔人口大多數的東方式的國家發生下一次軍事衝突的時候」<sup>25</sup>！

不知道〈托文〉作者對此將作何看？在筆者看來，這正是列寧根據國際局勢的新變化，尤其是根據歐洲革命被推遲、被延緩的特點，來著手制定新的戰略與策略，將過去那種具有速勝論傾向的、以面向西方工人運動高漲為支柱的戰略重點，轉向以東方民族民主革命為支撐的戰略重點的明證！儘管時間不允許列寧將之思考得更周密、更完整，但其思想的脈絡和方向還是十分清楚的。此後的歷史，至少在二戰全面爆發之前的十多年的歷史，基本上證實了列寧的判斷。對此，〈托文〉作者可以視而不見，也可以作出自己的另類解釋，但卻似乎沒有必要來以此非難別人，尤其是非難歷史！甚至為了強迫歷史符合自己的邏輯，不惜重構出一幅「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只是由於「工人階級的主觀領導的不成熟」才使之遭受了失敗的（二十世紀）世界歷史圖景，指責歷史沒有按照托洛茨基給出的「服藥規則」服藥，結果只能日復一日地被那些江湖騙子把它「藥死」。作者的推論是：「歐洲工人階級援助的遲緩，導致了俄國革命的蛻化，俄國革命的蛻化又引起了共產國際的蛻化。面對日益臨近的災難，社會黨」又是「不願進行抵抗」的「駝鳥」，結果，「歐洲工人階級就在希法亭、考茨基、鮑威爾、阿德勒、勃魯姆、斯大林、台爾曼、加香、多列士、狄亞斯之流的領導下，走向了自我毀滅。」<sup>26</sup>革命就這樣掉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為希特勒、佛朗哥

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這真有點歷史本來要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的味道了。顯然，在這裏，錯誤的是歷史，而不是理論！只是我不明白，作者列舉了這麼多不利於革命最後葬送了革命的「消極因素」，為甚麼就單單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積極因素」呢？這就是托洛茨基正式創立於1938年的第四國際！既然第三國際已經「蛻化」，那麼，第四國際為甚麼不能擔負起領導無產階級從失敗走向勝利的歷史重任呢？既然——如作者所說——「建立了明確、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和策略體系」<sup>27</sup>的托洛茨基，一直在「不停地向工人階級發出警告，並向其指出了避開危險走向勝利的道路」，那麼，工人階級們為甚麼要置之不理而聽任那些「之流」們將他們引向深淵？而且，如果真像作者所理解的那樣——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只簡單的是一個工人運動走向毀滅，而資產階級卻節節勝利的二元對立的歷史，那麼，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的成熟」又從何談起？「世界革命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取得勝利」的「一定條件」又在哪裏呢？總而言之，為馬克思所預言，列寧所期待，托洛茨基所堅持的世界革命之所以沒有出現，究竟是取決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較量、階級鬥爭呢，還是取決於更深層的社會結構變動？是由於無產階級的「主觀領導的不成熟」，向資產階級鬥爭不力呢，還是由於社會歷史的變化確實使原先還不夠成熟完善的西方民主體制開始表現出一定的活力和自我調節機能，在使工人階級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不斷有所改善的情況下，緩和了矛盾和對抗，使本來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階級鬥爭，逐漸轉向了可以通過立法與談判，進而通過妥協與退讓來加以調解的勞資衝突，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工人運動的政治衝擊力？自二十年代以來就持續步入低潮的歐洲工人運動，真的只是幾個「領頭羊」的錯？

至於作者在不是資本主義走向勝利，就是無產階級走向毀滅的獨特視角中重構出來的那幅二次世界大戰的圖景，就更加讓人莫名其妙了。如果希特勒的「奧斯維辛毒氣室」與盟國的「德累斯頓轟炸」、美國人的「廣島核子試驗」等，都不過是「資本主義世界」「在擊潰了歐洲工人運動後」所展示的「最新型的人類文明成果」，而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也只不過是「斯大林在大戰中替資產階級火中取栗」，那麼，又如何來解釋「資本主義世界」的英、美諸國要向「資本主義世界」的德國宣戰？並為最終剷除那滅絕人性的毒氣室而耗盡國力，死掉那麼多的生命？資本主義的美國確實不該朝資本主義的日本扔原子彈，但資本主義的日本又憑甚麼要偷襲同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呢？而且，又憑甚麼要向至少並不屬於社會主義的中國以及其他東南亞各國大舉進攻？燒殺虜掠，無惡不作？如果整個二次大戰的歷史，只是為美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新一輪繁榮」奠定基礎，那麼，包括中國人、美國人、蘇聯人、法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南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菲律賓人……等等、等等在內的所有世界進步力量、進步黨團、進步人士所組成的反法西斯聯盟，豈不都通通變成了「替資產階級火中取栗」的罪魁禍首？那場由幾個邪惡的軸心國家所強加給世界人民的戰爭，僅僅只是整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世界殺紅了眼的混戰？是一場絕大的歷史誤會？在作者的歷史拼圖中，各國人民為抗擊法西斯，抗擊軍國主義的危害所作出的英勇鬥爭，浴血奮戰，怎麼就變成了這樣一幅骯髒的畫面呢？世界人類在戰時和戰後為構建一個相對和平與安全的世界環境、國際秩序所作出的努力（儘管還很不夠！）、所取得的成果（儘管還極為有限！），為甚麼就見不到一絲蹤影呢？

歷史，難道真是一個可以任人打扮的婢女？

## 問題五：關於托洛茨基的評價

說實話，此刻來寫這節文字，心裏是頗為複雜的，或可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叫做一則以喜，一則以慮。喜者，托洛茨基問題終於是個可以平心靜氣來加以討論的話題了——儘管比之於我們在其他問題上的不間斷跨越，這一天還是來得太遲了一點，但畢竟也反映了生活中某些值得高興的變化。慮者，也正是因為這一天來得太遲，以至使不光是托洛茨基，而且還包括共運史上一些很有爭議的公案——思潮、事件、人物等，也都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認真的清理和總結。歷史的積欠拖得越久、越深，就會給今人或後人的把握與體認增加困難——現今思想理論界在某些方面所出現的偏頗和誤會，不能不說與此有很大關係。所以，我常想，假使這類歷史的清理能夠提早進行（十年？二十年？），那麼，至少像〈托文〉這樣所表現出來的某些輕率和片面，或許會減少一些罷？

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人物中，托洛茨基恐怕是最有爭議，也最具傳奇色彩和悲劇色彩的人物之一。傳奇和悲劇都來自他的經歷。在他那極富戲劇性，充滿了緊張和冒險的命運多舛的一生中，既有輝煌的成就，也有黯淡的敗落；既有煊赫的權勢，也飽嘗了失去權力之後的悲苦與屈辱。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青年社會主義自願者，到一個一夜之間聲名響遍整個歐洲的叱吒風雲的革命英雄，從一個隻慣於用口和筆進行戰鬥的文弱書生，到一個揮師統兵，馳騁疆場的紅軍統帥，這其間的反差有多大？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贏得了那麼多的成功與榮耀之後，又會受到那麼多的詆毀與迫害。從大權在握，令人生畏的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到被革出教門，四處飄泊幾無立錐之地的流亡者；從十月革命的直接領導者，到最終竟被指斥為這場革命的最大叛徒，這其間的起伏又有多深？作為權力角逐場中的失意者，前蘇聯官僚政治中的低能兒，他的後半生真可以說受盡了凌辱與磨難。但作為一個一生都在戰鬥，一生都在抗爭，所謂在命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也決不回頭的永不屈服、永不言敗的不妥協的鬥爭者，他的精神與人格又確實不無其可圈可點之處，甚至堪稱楷模和典範。在某種意義上，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他的「不斷革命論」——就其精神實質而言——的一個最好的實踐者！一個微縮了的精神標本！但最後，他既不是戰死沙場（按這兩個字的本義講），也未能終老天年，而是在他還充滿了生命活力與戰鬥激情的時候，悲慘地死於他的對手的陰沉的暗算之下！這就不能不讓人在寒透肌骨的悲涼中只好「欲說還休，欲說還休」了。

至於托氏所引起的爭議，則明顯來自他那充滿了矛盾的思想和性格。

大約從四十五歲起，托洛茨基就開始了反對斯大林及其專制主義的鬥爭，並為此而花去了他後半生的全部時間。從力量對比和歷史為他所設定的角色去看，這真可以說是一場命運懸殊，徒勞無益的英勇無畏之戰！是一場註定沒有希望取勝卻又不屈不撓，毫不退讓與妥協的勇敢者之戰！其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誓將鬥爭進行到底的西西弗精神，固然可歌可泣，可感可佩，但正是這個腳跟一旦離開革命的保護就會受到致命一擊的「阿基裏斯」，卻在歷史提供的為數不多的幾次有可能使他戰勝對手的機會面前，表現出令後來的所有研究者都迷惑不解的軟弱、怯懦和無所作為。托洛茨基是機會之神，歷史之子，對歷史事變有著近乎本能的敏感與直覺，深邃的洞見和非凡的膽識常常使他遠在歷史的大潮還沒有到來之前就能聽到它隱隱的濤聲，並善於抓住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機會，從而成為駕馭事變的能手——就如他曾在1905年革命和其後的十月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他曾像巫師一般，準確預言了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原則將必然導致的黨的蛻化<sup>28</sup>，也曾提早警告了法西斯的崛起及其造成的危害；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他也不幸言中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政策所遭致的失敗。然而，也正是這個一再表現出非凡預知能力的「先知」，卻在列寧已經將炸彈填好，只等他去動手引爆——在黨的十二大上代表列寧出面，去為受到壓制的格魯吉亞人辯護，向斯大林開炮時，他卻匪夷所思地放棄機會，以生病為由，拒絕了列寧的籲請！不僅如此，在列寧死後公

布列寧「遺囑」<sup>29</sup>，按理應照「遺囑」所示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時（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直接罷免斯大林的絕佳機會），托洛茨基卻再次判斷失誤，不僅未能果敢地抓住這次稍縱即逝的機會，反而有些無動於衷，錯失良機，故作寬洪地與他的對手們一起挽留斯大林，由此造成了他一生中最追悔莫及的錯誤。即便如此，機會仍沒有最後離他而去：1925年，當三駕馬車突然翻臉，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結成新反對派，與斯大林拉開架式爭吵時，托洛茨基只要行動起來，像他之前和以後所做的那樣，滿懷信心地投入戰鬥，提早與季、加結盟，那麼局面仍有可能改觀，歷史的天平仍有可能向他這一方傾斜。然而，關鍵時刻，他卻表現出了令人不可思議的退讓與回避，寧願默不作聲地呆在一邊袖手旁觀，也不肯投入他的火力！眼睜睜看著這最後一次機會同他擦肩而過。

是的，托洛茨基是雄辯家，是弄潮兒。與斯大林這樣總是隱身於幕後的黨務專家相比，他更適合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在亂哄哄的人群中，在唾沫橫飛的講壇上去施展才華，主宰沉浮。愈是激流滾滾，愈是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他的發揮就越卓越；反之，越是風平浪靜，越是按部就班，他就越不知所措。在那些追隨列寧多年的老近衛軍中，在那些更多是植根於俄羅斯本土文化、本土經驗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中（斯大林就是他們之中的典型代表），托洛茨基無疑屬於典型的「海歸派」、外來人，雖也不乏有他的追隨者，必要時也難免會搞些拉幫結派的「小動作」，但他的經歷、他的教養、他流亡國外時所受到的歐洲文化的薰染，甚至還包括他身上的某種浪漫氣質，都使他更像是一個渾身充滿了正義的激情和勇敢的想像的吉珂德先生，因而更渴望也更喜歡在正面的交鋒中，去光明磊落地挑戰對手，打敗對手，而不屑於躲在一邊，陰謀盤算，暗箭傷人，更不屑於去玩弄一些所謂的官場技巧、政客權術了。他的高傲自負，不僅使他一次次的低估對手，一次次的錯失良機，而且還使他在對待和處理一些關鍵性的政治細節上，過於的輕率馬虎，漫不經心。出於虛榮，他曾數度拒絕了列寧要他擔任自己的副手——副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提議；同樣也是出於過分敏感的虛榮——生怕給人造成爭奪列寧繼承人位置的形象，他又推掉了在列寧逝後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作全黨政治報告的殊榮；尤其在列寧去世後要不要及時趕回莫斯科參加列寧葬禮的敏感而又關鍵的問題上，他更是表現出了少有的笨拙與遲鈍。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上，托洛茨基可以說是被他自己的高傲性格一點點地打敗的。

至於講到托氏的思想、理論，那麼，今天已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亦如他整個一生的活動那樣，他的那些思想、理論，既包含有一些正確的、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同時，也存在著明顯的錯誤和混亂，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不切實際之處。就以其影響極大的「不斷革命論」為例，這個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爭議的理論，若就其精神意義而言，應該說還是具有某種合理因素的，但若就其思想內容來講，那麼，它所包含的冒險主義性質，它的急躁冒進的特點，卻也是不容掩飾也不能回避的。而且，從它所包含的那種畢其功於一役的內在邏輯去看，「不斷革命論」與他的另一大理論——「世界革命論」，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抵觸，至少兩者的契合與互洽不那麼的妥貼、圓通。至於托氏的其他理論，比如他的「熱月政變」的理論，他對黨和國家機關官僚化現象的批評，以及他關於蘇維埃民主的要求等等，顯然都具有相當的正確性、合理性。作為對蘇維埃黨和國家機關的蛻化現象，進而對斯大林體制及其痼疾最早發出的擔憂、警告和針砭之一，托洛茨基在這些思想和理論——以及本文所提到的其他一些思想和理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敏感與卓識，理應得到應有的尊敬與評價，這是無疑的。同時，又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這些思想、理論的正確性與合理性，也只有而且必須放回到一定的歷史框架中才能估價出來。因為，比這些思想和理論更重要、也更具有決定性的是，歷史的發展已經超越了它們所固有的邏輯，以及所承載的內容！更何況——正如本文作者所一再指出的那樣，托氏的這些思想、理論中，也還包含了一些明顯的缺陷與不足，甚

至是矛盾和混亂。所以，整個來看，對托洛茨基一生所作出的思想理論貢獻，似不宜估價過高。

應該看到，在托氏的思想活動中，信徒一般的忠順、執著與思想家的獨立意識、創造衝動總是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主導其精神創造活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線，時而交相激蕩，發出撞擊的嘶鳴，時而和諧共振，奏出動人的音符。由此構成了一種我稱之為「托洛茨基理論困窘」的思想現象。大體說來，這一思想現象最突出的表現是：先假定有一套不證自明的公理系統，再按照它所給出的公設與步驟來演算歷史運動。但由於歷史運動是變數不是常數，是革命質能公式中的「x」，為了使演算結果符合公設推導的標準答案，這就需要托洛茨基運用他的理論活動，去補足運算中的缺項，把未知數變成已知數。前者——公理系統——給定了托氏理論活動視域的最大介面，後者——歷史中的未知部分——則為他的理論創造留出空間，使之能夠作一定量級的跳躍和偏離。由於規則限定，托氏的創造既有可能在他目力不及的遠方與系統的某些方面發生衝突，同時也有可能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注意盡可能地與系統保持一致，不作太大的偏離。所以，與教條主義相比，托氏的理論多了幾分機會主義的氣息，而與機會主義相比，卻又多了幾分教條主義的意味，最後，與這兩種主義相比，又不免多了一些修正主義的性質<sup>30</sup>，只不過，它不是為了使理論符合現實而去修正理論，卻是為了讓現實滿足理論而去修整現實、提升現實。所以，托氏的理論最終總免不了有些急躁、操切的痕跡。

在我看來，這樣的「理論困窘」，是托氏一生的宿命，也是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及其運動——包括他所創立的第四國際所面臨的矛盾和困境所在！亦如他早年的飄忽身影，正是他時而孟什維克、時而中間派、時而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搖擺所投射的影像一樣，托氏在其後半生傾盡全力所開展的反斯大林鬥爭，之所以在現實中處境尷尬，模樣難堪，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從這裏找到說明。儘管我們不能否認，托氏的鬥爭確實有堅持十月革命理想的一面，但作為一種運動而不僅僅只是思想，他自身所固有的窘困，卻早已將他設定在一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二難境地，再難以走出那個自我相關、自相纏繞的怪圈，而只能勉力地去擔起命運的重閘，扮演起一個左右受敵，進退兩難的尷尬角色。因此，即使是托洛茨基本人，也很難擺脫那個斯大林惡咒對他的困擾（斯氏常指斥他反對列寧、反對列寧的黨、反對列寧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等），很難擺脫他與整個布爾什維克黨、與整個蘇維埃社會的關聯，因而總是竭力想把自己所反對的和自己所捍衛的東西區別開來。他既無法否認蘇聯的存在，又無法接受蘇聯的現實，便只好極力將斯大林與俄共黨、將斯大林的專制體制與蘇維埃社會的制度與性質區別開來。所以，他從始至終都不肯放棄蘇聯是個「工人國家」的政治判斷。而他愈是想徹底解開那個纏繞不清的結，就愈是陷入到更深的矛盾與痛苦之中<sup>31</sup>（他在理論上一步步的退讓與此不無關係）<sup>32</sup>。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整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所面臨的困境與尷尬。

以上自然也只能算是一種個人角度、個人眼光。對托洛茨基來說——不管是就其思想還是就其活動，分歧和爭論總是難免的。所幸的是，在經過幾十年的折騰之後，如今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已大體能夠按照歷史和事實，尤其是按照歷史發展的方向來客觀進行，而不必再像過去那樣，動輒就從典冊章句出發，動輒就要看他是否合於典章還是不合於典章。更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過去看得不太清楚的問題，如今已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一些過去因為種種禁忌而讓人不敢觸及的問題，如今也已變得不再那麼的森嚴和不可冒犯了。所以，即使迄今為止，托洛茨基仍是唯一一位沒有獲得正式平反的反對派領袖，但在許多研究者心目中，當年由斯大林一夥所強加給他的那些罪名和指控，則早已反過來，成了斯大林時代獨

裁、專制的恥辱柱。它們顯然已不再是對托氏評價的障礙。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對托洛茨基的公正評價，或者說恢復托洛茨基本來面目的問題，應該不會再是甚麼太困難的事。從這一點說，我對〈托文〉作者所作出的研究和努力是尊重的。我不能苟同的是——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而言，如果只是一味地執著於一種全面翻牌的邏輯，無視托洛茨基思想與活動中的那些缺陷和不足，硬要將過去的一無是處改寫成一無所非，把一塌糊塗說成全面正確，通體透明，以便再為人們塑造出一個無所不知的「先知」或「救主」，那麼，恕我直言，這與其說是在恢復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倒不如說是在製造新的神話與迷信！而今的讀者，又還有幾人會認真地相信這樣的神話和迷信呢？

## 註釋

- 1 《視界》第6輯，第231-232頁。
- 2 見〈給代表大會的信〉，即所謂「列寧遺囑」。列寧在信中首先就提出擴大中央委員會人數（增至50-100名）以防止可能發生的分裂的建議。對此，他直言不諱地寫道：「……穩定性的問題基本在於史達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在我看來，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關係構成的。」然後，在對兩人作出簡略評論後又說：「現時中央兩位卓越領袖的這兩種品質會無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們黨不採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見《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6卷，616-617頁。
- 3 同註1，232頁。
- 4 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90、502頁。
- 5 為避免誤會，這裏有必要指出，以上一段文字，決無否認托氏反對官僚化、要求民主化等思想合理性的含義。此處強調的是他的性格傾向，並不關乎思想。但鑒於〈托文〉對托氏在這方面的主張評價甚高，指出如下一點仍然是必要的：托氏在二十年代中期所有關於黨內民主的論述，都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僅僅有黨內民主是不夠的，要實現表達的自由，就還需要國家制度和政治結構的保障，實現社會民主。指出這一點，自然也不意味著就否定托氏主張的意義，這仍是需要提醒的。
- 6 參見《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112-113頁。
- 7 同上，第502頁。
- 8 「糧食稅，是從極度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所迫使採取的特殊『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制的一種過渡形式。」見列寧〈論糧食稅〉，《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2卷，第333頁。
- 9 同上卷，第315頁。
- 10 《列寧全集》33卷，第155頁。
- 11 《我的生平》下冊，華東師大出版社1982年版，第511頁。
- 12 此說採自王樹桐，錢亞軍〈評「戰時共產主義」與直接過渡道路〉一文，見《蘇聯現代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48頁。
- 13 列寧在「工會國家化」問題上的態度，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經歷了一個從贊成到反對的思想轉變過程，其原因從根本上講正是由於從戰爭向和平的轉折所致！詳見拙文〈列寧與「工會國家化」問題〉，載《馬列主義研究資料》1988年第三輯。
- 14 參見金雁《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8頁、第10-12頁、第23頁。
- 15 參閱同上，第25-26頁。
- 16 《視界》第6輯，第238頁。

- 17 參閱同上，第236-237頁。
- 18 第237頁註腳9。
- 19 以上引文均見上書第238-239。
- 20 同上，第240頁。
- 21 同上，第242頁。
- 22 《列寧全集》32卷，第467—468頁。
- 23 同上，31卷，第358頁。
- 24 同上，32卷，第469頁。
- 25 以上引文均見《列寧全集》33卷第452-454頁。
- 26 《視界》第6輯，第241頁。
- 27 同上頁，旁註13。
- 28 1904年，托洛茨基就在其抨擊列寧「最刺耳」（多伊徹語）的一本小冊子《我們的政治任務》中，說出了這樣一句後來可能都會令他驚訝不已的話：「首先是黨組織（秘密會議）以自身取代全黨；爾後是中央委員會以自己取代黨組織；最後是一個獨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員會……」轉引自多伊徹《武裝的先知》，第100頁。
- 29 所謂「列寧遺囑」，事實是指列寧於1922年12月23至26日通過口授記錄，斷續寫下來的〈給代表大會的信〉（包括1923年元月4日增加的一小段補充）。由於內容極其敏感，涉及對幾位黨的高級領袖的評價，所以當時就按列寧指示制為一式五份，作為絕密材料封存。其中，一份歸入列寧的秘密檔案，一份留在列寧身邊。另三份交由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保管，上面注明只有列寧或列寧死後方可由克魯普斯卡婭開啟（列寧秘書因忌諱未便寫上「列寧死後」的字樣）。但事實上，據新披露的材料，有確鑿的事實表明，列寧這份檔——至少是其最初（23日）口授的部分，早在當天夜裏就已為斯大林獲悉，並部分地遭到改動，爾後，黨的其他領袖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通過不同的管道和方式，先後獲知了這部分信的內容。只是，托洛茨基至死都不知道，他所看到的實則並非原本。參閱王政和編譯《列寧遺囑》一書，敦煌出版社2000年版。1924年5月22日，在列寧逝後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即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前，克魯普斯卡婭始將這封信遞交中央，並在為大會作準備的中央委員會上作了宣讀，要求中央遵照列寧意願在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此信。她的要求遭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反對，最後，會議通過季諾維也夫的提議：只有在有選擇的一部分代表團成員中宣讀此信。這裏說的「公布」即指這一情況。信中有關撤換斯大林的那一段話即1923年元月4日的補充是這樣說的：「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見《列寧全集》36卷，第618頁。
- 30 此處需要申明，筆者所借用的這幾個術語，只是從一般的意義上來加以使用的，它決不意味著筆者仍在沿用其舊有的意識形態含義，尤其是歷史曾經賦予的那些政治含義！
- 31 這樣的痛苦與矛盾在其晚年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在發表於1939年11月的〈捍衛馬克思主義〉中，他曾以一種憂傷而略顯悲壯的調子，講出了他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可能結果的猜測，指出如果戰爭沒有引發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或者西方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後也發生了像俄國革命那樣的蛻化，那麼「我們將不得不承認……（斯大林主義）根源不在於國家的落後也不在於帝國主義的包圍，而在於無產階級在本質上不能成為統治階級。那時就必須拋棄懷舊的觀念，承認今日的蘇聯是普遍的新剝削制度的先驅。……如果國際無產階級真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麼這種前景……不管怎樣令人沉重，……也應毫無保留地公開承認，以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綱領已成為一種烏托邦。」轉引自多伊徹《流亡的先知》，第504頁。
- 32 舉例來說，這種退讓明顯地表現在他從最初認同黨內統一的原則，到進而要求黨內派別鬥爭的

合法性，再到最後——在他流亡國外之後，更提出了黨外有黨，建立第二政黨的主張。與此相應，他對蘇聯社會性質的判斷也在一點點後退，從最初只是擔心它的「熱月化」現象，到後來論證「熱月化」已成現實，蘇聯國家政權已經蛻化為由一個特殊階層——官僚統治集團掌握的「工人國家」，因此需要在蘇聯發動一場「政治革命」來推翻官僚集團的統治！即使如此，托氏仍然認為，一旦新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對蘇聯造成威脅，也應起而「保衛蘇聯」！可參閱《被叛賣的革命》中有關論述。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六期 2005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六期（2005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